

严济慈与钱临照的师生情

严慧英



严济慈(前排右一)与李石曾、彭济云、吴学简、钟盛标、钱临照(后排左一)合影。

“蜡炬精神在，桃李天下知”，这是钱临照先生在追忆恩师严济慈时写下的句子。钱临照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金属晶体范性形变、晶体缺陷与物理学史等领域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师从中国物理学泰斗严济慈先生。二人均为我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师生相携而行，在我国科研教育事业发展中共同书写下璀璨华章的同时，更在前后相继的教诲与传承中，彰显出充满真挚情感与家国情怀的师生情谊。

为国科研 同攀高峰

1930年，留法归来的严济慈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他写信给居里夫人，要来了些含镭的盐样品和放射氯化铅，筹建起放射学实验室和镭学研究所。与严济慈一同做研究的有几名年轻人，钱临照就是其中之一。

此间其实另有一番曲折。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不久，就读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时曾师从严济慈的钱临照，被迫离开当时任教的沈阳东北大学，入关来到北平，借住在严济慈家中。为生计所迫、正值彷徨无计之时，他一度决定南下就任上海工部局一家电话局的技工职位，辞行时严济慈加以挽留，劝他跟自己从事科研工作。虽然研究所4名助理员编制已满，严济慈还是额外录用了他，后来更推荐他到英国著名实验室留学深造。

此后几年，严济慈带领钱临照等几个年轻人潜心从事科研，做出了中国本土最早的物理学研究成果。1932年，严济慈、钱临照合作在《法国科学院周刊》第194卷发表了论文《压力对照相感光性之影响》。这是该刊第一次刊载我国科学家在国内取得的科研成果。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严济慈与钱临照等人合作完成41篇论文，达到其科学研究的鼎盛期。其中截至1935年，严济慈与钱临照合作发表的科学论文有8篇，并在三年内完成了压力对照相乳剂的感光作用之研究、水晶圆柱体在扭力下产生电荷及其振荡的研究等两个课题。由此，严济慈被钱临照视为对自己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三位老师之首，而严济慈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科研精神，也为钱临照一生忠实传承践行。

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严济慈当时正在法国，他不顾友人劝阻，毅然携家眷从法国经由越南来到昆明，

“和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严济慈在昆明继续主持从北平迁来的物理研究所相关工作，此时钱临照同老师一起，“完全转向战时工作”，在黑龙潭龙泉观的破旧古庙附近几间临时的实验室及小工厂里，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下，研究应用光学、研制抗日急需的军用仪器。

在日军不时轰炸的险恶战争环境中，严济慈与钱临照共同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台高倍率的显微镜镜头，中国光学奠基人王大珩称“其光学质量与外国名厂的产品不相上下”。基于此制造出的500架1500倍显微镜，被送至前线的医疗阵地以及科研机构，还有1000多具水晶振荡器，被安装在无线电台、警报器上，300多套军用测距镜和望远镜被运往我国及印缅战场。这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钱临照后来对此深情回忆：“回想当年，虽苦犹荣，不禁再次感念严济慈先生对科学的一片赤诚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为国育才 代代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严济慈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才上来，而钱临照也随着恩师的脚步，在老师一手创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国育才，直到1999年在合肥去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终生。

1949年9月，郭沫若邀请严济慈参加中国科学院筹建的“组织领导工作”。严济慈曾一度犹豫：“一个科学家一旦离开实验室，他的科学生命也就

从此结束了。”但郭沫若的一番话打动了他们。“这话很对。但是，倘因此而使成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不是更大的好事？”

严济慈自此全力投入到中国科学院的创建与发展工作中。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东北分院院长、数理化学部委员、技术科学部主任、副院长以及《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主编等职务；积极参与制订和组织实施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规划；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培育科学新秀，促进我国同世界各国开展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中科院决定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严济慈参与筹备了学校创立，更于花甲之年重登讲台，为莘莘学子亲执教鞭。他讲课生动形象，神采飞扬，学生争相聆听教诲，一时蔚为盛景；而他编写的一本本著名教材，同样是深入浅出，深受欢迎，培育了我国几代科技人才，从更广泛的层面上遗泽无穷。

钱临照也在1960年调入科大任教。多年以后，他以充满感情的鲜活笔触回顾了老师在科大授课的盛况：“听课的学生挤满了学校的礼堂，而先生则如同炉火纯青的表演大师，为台下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展示着科学的妙味……”而这无疑激励了他以恩师“甘当人梯，化作春泥的忘我高风”为榜样，鼓舞了他为科大贡献余生。尤其是1970年科大迁往合肥时，他毅然决定与科大共进退，将户口一同迁往合肥，为学校谋求各方支持、组建教师队伍、规划学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真正成了科大的一面旗帜。

为国揽才 前赴后继

师生二人在教育事业上的教诲与传承，也体现在对求学海外的学子的关爱与感召中。两位先生都有早年赴欧留学的经历，深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重要性，但更笃定胸怀祖国、学成报国的爱国之心。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点，同时也推动更多的学子前赴后继。

严济慈晚年推动实行了由李政道发起的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自1980年正式启动，前后十年间招录了915名赴美深造的学子，成为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培养人才的有效方式，学成回国的学生为我国的科研事业发展影响深远；钱临照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人才外流现象，尽己所能为他们回国服务创造条件，还亲笔写信给很多出国深造的优秀人才，介绍国内、校内情况，关怀他们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他还在信笺上加盖“月是故乡明”的印章，对他们寄予殷切期待，激励了许多学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中国科学院侯建国院长便是其中之一，作为钱临照的博士生，他在留学期间就受到钱先生的关怀和感召，从而更坚定了回国服务的决心。

循着严济慈与钱临照二位先生共同的历史足迹，我们如同一起经历了他们与国家命运共振偕行的壮阔史诗，从中不但能感受到他们深厚的师生之情，也深切地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报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爱国情怀和高尚品格。

(作者为第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严济慈孙女。)

父亲一生的追求

韩宗燕

这块展板是201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家乡重庆隆昌党史研究室王全友主任发过来的。左一是韩代英，左二就是我的父亲韩劲风。

我的父亲韩劲风16岁时就报考黄埔军校；19岁在四川大学外国文学系读书，是学校中共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因遭国民党政府通缉，不得不离开家乡。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并与周钢鸣一起成为真如小组负责人。1936年10月，他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追悼会和葬礼。

1937年“八一三”上海沦陷后，中共长江局委员董必武要共产党党员朱婴回家乡华容创办一所推动抗日、培养进步青年、输送革命力量到延安的学校，中共湖南省工委派共产党员，就是韩劲风和朱维刚分别担任训育主任和军事教官，并确定韩劲风建立党组织。

“长沙大火”后华容东山中学由朱婴带队，组建了“华容东山中学救亡旅行团”绕道去了延安，这其中还包括背着一个小包从家乡赶到华容求学的我的舅舅，他后来在延安抗大做了吴印咸的学生。这一批从延安走出来的人，都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重要职位。

抗战时期，韩劲风在《救亡日报》《武汉日报》等进步报纸工作，他曾给我们讲述过办报要在夜间工作，常常连夜写社论的经历。1941年2月28日，在桂林复刊仅三年的《救亡日报》又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韩劲风和总编辑夏衍一起连夜撰写休刊社论



《我们失去的是锁链……》，凌晨送到印刷厂印刷，之后韩劲风在桂林被捕入狱。出狱后他与单独联系的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回到四川，曾在多家进步报刊工作，再后来又辗转香港，加入民盟。

1948年韩劲风携家眷与李济深等民主人士一同乘海轮回到祖国大陆，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韩劲风参加了创办《光明日报》的工作，后又在《人民文学》《新港》和天津文学研究所等单位工作。

1990年，在韩劲风逝世6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题为《信仰》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文中

讲述了韩劲风为恢复党籍不懈追求的经历。父亲对党的追求是执着的。即使是在“大跃进”年代紧张的工作中，“文革”的“牛棚”“干校”里，他始终不放过一切线索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当年的党组织领导人。可是，单独联系的上级寻找起来如大海捞针，何等之难！

我从刚懂事时就都知道，韩劲风每个月都要先从工资中拿出几元钱买邮票，然后才把工资交给母亲。他写过无数封信，尽管其中一多半都被退了回来，可是他还是不断地写啊写。当时我还太小，不知道他写的是些什么内容，但我看到了他的执着和真诚，在一封封信上，寄托着他不懈的追求，也许还不至于固执。“文革”后期韩劲风被下放农村，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继续在写信，他每天都要到村口去等邮递员，送去厚厚的一摞信，也送上他的希冀。取回两张他订阅的报纸和上面贴着“查无此人”字条的信，同时取回无言的失望。

自1941年被国民党抓捕入狱，韩劲风就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之后的40年中，他心心念念的就是恢复党籍，个中心酸，难以言说。幸运的是，在去世前的8个月，1985年4月，中组部调出韩劲风档案直接审查决定，为他恢复了党籍，这是对他一生的追求给予了评价。

韩劲风的很多文章及日记照片等都在“文革”中被抄家损毁，我们现在能搜集到的只有极少数资料。从《甘霖的都市》和《新港之夜》两篇散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新中国炙热的情感，一篇是他出访南时所作，另一篇是刚调到天津时的作品，他的文章能把历史知识、地理知识、典故等融入激情文字中，让人读起来回味无穷。他写给子女的信或是刚提笔写的一首新诗，或是讲评相关的故事，让我们打开思路，从各个方面学习知识。三姐至今珍藏着她20世纪60年代初到桂林演出时父亲写给她的一首《飞笺答施儿》诗，他在信中给她介绍了桂林的历史和地貌，让她走到一地就要对当地的人文和自然风光细心体味欣赏。

尽管曾经因为失去党籍使他在工作中倍受挫折，但他心中追求革命理想的火焰从未熄灭，即使是在至暗时刻，他也会拿出珍藏的洞箫吹一曲《春江花月夜》，既坚毅又乐观的性格支撑着他终生追随着自己的信仰。

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我相信他在天之灵也会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巨大变化，祖国各地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而欣慰。在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缅怀老一辈革命家，不忘初心，只要牢记为伟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就一定会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

章太炎奔走吁抗日

沈治鹏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三省垂危，大片国土即将沦丧，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消息传来，章太炎痛心疾首，他虽已是迟暮晚年，却犹如一头震怒的雄狮，投袂而起、奔走呼喊。他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应向日本正式宣战。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锦州，中国守军全线溃败，东三省沦陷。章太炎悲愤至极、焦虑至极。1月13日，与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联名通电：“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请速自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充”，要求国民政府“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并说“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

1933年1月12日，西北军首脑冯玉祥派人面见章太炎，对时局表示焦虑和担忧。冯玉祥坦言：“倘有赴难之机，决不惜一切之牺牲也。”他为这种抗战热忱所感动，立即给冯玉祥复信，希望他与张学良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这封信尖锐地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蒋介石

比喻为卖国媚寇的西太后，说：“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宁送朋友，不送家奴’。”同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全国，宣誓抗日，决心“武装保卫察省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章太炎读此通电，欢欣鼓舞，立即与马相伯联名通电声援。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掣肘，察哈尔抗战连连受挫，冯玉祥被迫离职，章太炎对其处境深表同情。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让华北失守，章太炎义愤填膺，他在一首诗中借古讽今，将最高当局比喻为南宋小朝廷，无情鞭挞其苟且偷安、怯弱可怜之状：“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

蒋介石对这位民国元勋既恼火异常，又无计可施。只得请章太炎的金兰兄弟张继从中劝说：“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为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愿弟明以教我。”如此慷慨悲愤的质问，张继无以作答，只得默然。

徐复观拜师

刘浪

徐复观早年投身军界，后来成为现代新儒学大家，而他“决心叩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

1944年春，陆军少将徐复观在同乡好友陶子钦处，偶然读到熊十力《新唯论》上册，顿时为之折服。他打听到熊十力此时正在重庆北碚，暂住梁漱溟主持的勉仁书院，立即写了封表示仰慕的信去。不几天，收到回信，粗纸浓墨，信中先是讲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接着责备他字迹潦草，诚敬之意不足，今后要特别注意。徐复观当即复信道歉，说明他实在一向不会写楷体字。几番通信后，有一天熊十力来信表露了同意收他入门的意思，说徐复观可以去北碚看他。

时住重庆南岸的徐复观，郑重其事地穿着军装，前往勉仁书院第一次拜见熊十力。见面后，徐复观请教应

该读些什么书。熊十力推荐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他说早就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

徐复观过段时间再去，说《读通鉴论》读完了。熊十力问：“有点什么心得？”他接二连三说了许多对这本书的批评意见。未等说完，熊十力大声骂道：“你这个东西……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徐复观被骂得目瞪口呆，但对熊十力的学问和见识则更加敬佩。

关于恩师的这番斥责，15年后，徐复观撰《我的读书生活》回忆说：“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从中他领悟到，“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才是读书治学的基本门径，其学问随之日益精进。

萧乾河口遇险

崔鹤同

1938年夏，失业赋闲在昆明的萧乾，突然接到《大公报》胡霖社长的电报，要他火速赶往香港共同创办《大公报》。于是，萧乾就准备从昆明坐火车到安(越)南的海防，再从那儿搭轮船去香港。

当时他和施蛰存结伴同行。两人在火车上对坐窗口，天南海北地闲聊。聊着聊着施蛰存就打起盹来。平素萧乾身边总会带个小本子，可以随时地像画家作素描那样做些文字写生。这时，他又拿出小本本，用文字兴趣盎然地描写窗外的滇南风光来。

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写着时，突然有人从背后猛地把他紧紧地擒住。原来是宪警。他连忙对前来的两名宪警申辩说，请不要误会，我只是在作文字写生。施蛰存也被惊醒了。但两个宪警一口咬定他是汉奸，是在国境线上偷绘地形图，一定要把他带去

审查。车到河口，停了下来。别的旅客都去边境站，经检查后，就能出境，进入安南。萧乾却被两名宪警押到车站旁的稽查处。施蛰存坚持陪萧乾同往，路上还就萧乾的身份问题同两名宪警争辩不休。

审讯时，萧乾没有律师，施蛰存证明萧乾“八一三”之前在上海《大公报》当编辑，也说明了他在昆明有哪些社会关系。他还解释萧乾是写文章的，并且出过什么书。这时，隔壁房间里在打长途电话，主审人写了张纸条传了过去。最后，一个袖口上镶了三道箍的官儿，推门进来朝主审人点了点头。大约是昆明警察局来了电话，证明萧乾确是“良民”，这样他才被无罪释放。

总算虚惊一场，想想也后怕。这也多亏了施蛰存，否则萧乾还不知被押到什么地方去了。从那以后，萧乾就放弃搞文字写生这个习惯了。

高晓声怕人来他家乡

周二中 顾燕

高晓声的家乡江苏武进农村是水乡，一个特点就是鱼多。在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青天在上》中，主人公陈文清这样介绍自己的家乡：“我的家乡是漂亮的。人好，风景也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样不亏，从来就是鱼米之乡嘛！我家门前有条河，是个聚鱼的水箱，客人来了，男主人就架网，女主人就烧红了锅子等鱼来煎，决不落空。我小时候就喜欢捉鱼，有鱼捉就不要命。这次你去不，我就架网去捉，你烧红了锅子等着，包你吃新鲜的。”他说的确实是实话，那个时候他的家乡鱼确实多。

高晓声的家乡另一个特点就是美。高晓声说，“我出生的村庄，叫董董，进草塘浜两里路，有一条河而短又深向西伸，叫芳泉浜，一共不过半里长，船一划到芳泉浜的沟梢，上岸就是我的家门口。”“我家乡的那些河流，留给我的印象，确是绝顶的美丽。长江里那些浑浊的水，从芦浦江冲进草塘浜后，已经精疲力竭，不胜负荷，马上放慢

脚步，卸除一身污垢，流过百十丈，水质就清白了……”“草塘浜里的大片青草碧水，通常都把人间浓浊的烟火气洗涤得干干净净，使人眼目清爽，心地光明。过了几十年，回想起来，还使人着迷……”

但是，后来随着大办乡镇企业，污染加剧，高晓声的家乡也难逃劫难，河水不再像以前那样清澈了，鱼虾也少了。对此，高晓声着急了，他曾这样说：“前些天南京师大附中有位老师打电话来，说他们学校里的同事们看到课本上选有我的《家乡鱼水情》，觉得我的家乡很美，想去看看……我立刻劝他们别去，因为我写的是我家乡从前的鱼水，现在已经难于寻觅了……不管怎么样，它仍旧是我的家乡。最近我又悄悄地回去看了它一眼，这次使我更加吃惊。我描绘得那么婀娜多姿、清明澄澈的草塘浜已经病危，临近死亡了。”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了。

然而现在情况又发生了变化，高晓声家乡的河水又变清了，可惜他已于1999年去世，不然他会说：欢迎你们到我的家乡来！